

周政保报告文学评论集

周政保 著

“报告”与报告文学——
何谓“文学性”——
全方位的真实——“片面真
实”与“合理想象”——
从瓦尔拉夫说到斯特莱切
——安身立命的基点——
文学活动及环境

广东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周政保报告文学评论集

周政保 著

“报告”与报告文学——何谓“文学性”——全方位的真实——“片面真实”与“合理想象”——从瓦尔拉夫说到斯特莱切——安身立命的基点——心理活动及对话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周政保报告文学评论集/周政保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8. 11

ISBN 978—7—218—05985—3

I. 周… II. 周… III. 报告文学—文学评论—中国—文集 IV. I207.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70398 号

责任编辑	赵殿红 夏素玲
封面设计	林小玲 陈小丹
责任技编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台山市人民印刷厂有限公司 (厂址: 台山市北坑工业开发区)
开 本	889 毫米×1194 毫米 1/32
印 张	9.625
插 页	1
字 数	250 千
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8—05985—3
定 价	42.00 元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出版社网址:<http://www.gdpsh.com> 电子邮箱:sales@gdpsh.com

图书营销中心:020—37579604 37579695】

目 录

代序：任何事情开始时都是梦

——我看周政保（周涛） (1)

关于报告文学创作的六封信 (7)

从“非虚构”说到“小说化”描写 (38)

非虚构·讴歌型创作中·叙述方式

——关于报告文学创作的对话 (60)

挑战的前沿文体

——报告文学的定位与创作品性 (76)

传记与报告文学创作 (84)

“介入”与“体验” (90)

文学性从何而来？ (99)

报告文学与社会生活问题 (103)

报告文学的“讴歌” (107)

从素材的堆砌说“长风” (111)

报告文学创作的长势或病态 (116)

报告文学的危机 (125)

“纯文学”与畅销书 (128)

关于报告文学的问答 (132)

永远高扬现实主义精神的旗帜

——军事题材报告文学创作 50 年随想 (146)

呼唤前沿精神

- 1998 年报告文学创作评估 (152)

距世纪精神及跨世纪忧虑

- 近期 (1999 年) 报告文学读札 (156)

《大国寡民》：向邪恶宣战的文学干预 (164)

作家采写的“原则”

- 读长篇报告文学《东方马车》 (167)

从《西藏墨脱的诱惑》说起 (173)

历史阵痛中的艰难跋涉

- 评中篇报告文学《大王魂》 (185)

“强国梦”与人的精神

- 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 863》 (191)

苦涩而辉煌的精神史

- 评长篇报告文学《走出地球村》 (197)

为战略导弹“筑巢”的人

- 长篇报告文学《鸟瞰地球》 (200)

铸剑的史诗

- 读长篇报告文学《大国长剑》 (203)

马家军：独一无二的“版本”

- 介绍长篇报告文学《马家军调查》 (205)

朝圣世界高地

- 读《平原动物上高原》 (208)

《金色喜马拉雅》：究竟追求什么？ (210)

报告文学创作的本色

- 《边关》读感 (213)

《民间包公》：歌颂·剖露·警告 (216)

《西藏，1951 年》：精神的怀念 (219)

《厄运》的意义：历史与现实 (222)

炎黄子孙精神折光

- 读特写集《九七香港风云人物》 (227)

各式各样的联想

- 关于《爸爸的心就这么高》 (230)

为当代青年写真

- 读长篇报告文学《发现青年》 (233)

现实同样是一面镜子

- 关于《第一种危险》 (235)

- 《北中国的太阳》：“喷薄而出”？ (238)

文学面对历史：真实的魅力

- 评长篇报告文学《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 (241)

报告文学作家的体验与感悟

- 关于《大迁徙》与“三部曲” (243)

穿越塔里木的“坚”与“韧”

- 《世界沙漠第一路》读记 (257)

寻找跨世纪精神

- 读长篇报告文学《跨越苍茫》 (259)

明镜高悬审计官

- 读报告文学《执著人生》 (261)

- 《铁打的营盘》：战争与和平的宣言 (264)

问天：“堡垒”是怎样形成的

- 读报告文学《龙门圆梦》 (267)

警世的焦灼

- 从《好梦将圆时》说到军旅文学创作 (270)

在更高的台阶上审视历史

- 读报告文学《8·23炮击金门》 (275)

“出奇制胜”的新鲜提供

- 读报告文学《节日与生存》 (277)

独树一帜与一目了然

——读报告文学《万名罪犯大转移》 (280)

“泰山挑夫”的歌颂与现实感

——读报告文学《中国有座鲁西监狱》 (283)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从《中国两弹一星实录》说到《话说国防》 (288)

《中国农民解放备忘录》：历史深处的“现实” (292)

《落泪是金》：良知总会出场 (294)

《大江源》：怆然动容的历史 (296)

《山脊》：中国的问题与奋争 (298)

《装甲团的女团副——张可》：让人大开眼界 (300)

强国不是梦

——《中国国防科技报告文学丛书》读记 (302)

代序：任何事情开始时都是梦

——我看周政保

周 涛

我与周政保认识交往，已有二十年了。他说：“你对我了如指掌。”其实也不尽然，因为周政保不简单，不是很容易就能洞彻肺腑的人。可是谁又是一眼就能洞穿的人呢？成熟的、有一定阅历并受过些挫折的人，可以说都是复杂的，都是不容易认识 and 理解的。甚至于一个人活了一辈子，对于自己是不是可以说完全认识了？我看也保不定。

只不过周政保和我相比起来，显得更复杂、更隐忍、更大度一些，同时也显得更含蓄和坚韧一些。这里面有性格的原因，也有家庭、社会和生活经历的原因，这些原因造成我们俩交往当中一度起了波澜，但这些波澜也使我对他有了深一些的了解。

所以我说周政保不简单，不简单当然就是复杂。

有些对周政保不够了解的人，仅凭印象就说“周政保是个书呆子”。这结论实在太表象化了。我对他们说：“周政保可不是书呆子，周政保是有政治头脑的人，而且是一个善于安排自己人生道路的人。”

认为他是书呆子的人，大多因为他戴了一副深度眼镜，时常与人迎面而过不打招呼，因为他没认清楚是谁。还因为他 80 年代初以研究生身份调干入伍，始终未能把一个敬军礼的问题弄得比较标准化。仅凭这两点把一个人打成“书呆子”是不够分量的，这说明军营在对知识分子的认识上还始终处于初级阶段，未能完全脱掉游击

习气。事实证明，他在入伍以后的十几年岁月里，对军事文学现状的研究和评论，作出了自己独特的、卓有成效的贡献。这说明他适应能力很强，他能够很快地把自己学到的知识和能力深入到一个全新的陌生领域。

另外，周政保是一个很有心劲、很能吃苦的实干家。他不尚空谈，也从不怨天怪地，很少有人了解他早年的寒苦和青年时离乡万里而受的磨炼，他从不轻易说这些。对此，我与他认识了二十年，而认知也是非常模糊的。他这个人，能装得下事。

对他的这方面，我曾经有过一段不著名的“蜗牛的轨迹”论，至今他可能还不一定知道。三年前的夏天，我陪《昆仑》杂志的编辑殷实去和田，在那个远离北京的塔克拉玛干边缘，一切都显得与这个时代离题万里，丝毫不搭边际。我当时忽有所感，就对殷实说，如果一个人的一生在这个世界上是一只蜗牛的话，那么有这样一只蜗牛：它曾经被命运抛到一个比这里还遥远、还荒凉的地方，被抛到和田的某一个县的农场里。但是它不认命，它往外爬，爬呀爬，先是到了一个报社，然后考了大学，毕业以后又被一阵风吹回去；它后来又考研究生，第一次外语分不够，没录取，它苦攻一年外语，又考，第二年考上了。后来他从这个地方爬了出去，爬了多远呢？现在他在北京。

“这个蜗牛是周政保！”殷实像小孩似的高兴得大叫起来。

“正是”，我说，“你要想了解一个人，就应该首先了解一个人的这种‘蜗牛的轨迹’，这是一个人最好的说明，比语言和表情都更真实。”

殷实说，“周政保太不容易啦！”

人生有时候也正和蜗牛一样，在粗粝的道路和柔软的躯体之间，需要痛苦、泪水、屈辱，奋斗这样一些分泌出的体液来润滑，来保护自己前行而不致擦伤。这些同时也是动力，它让一只背着房子的小生命不至于停顿下来，安于某一棵榆树下的露水。

这时候我才理解为什么周政保认真真地把桑德堡的一句诗当作座右铭抄在笔记本的扉页上，那句诗是：“任何事情开始时都是梦。”

屈辱和梦想是理解周政保的一把钥匙，可惜我找到这把钥匙的时候，已经到了90年代了。

这说明，理解一个人是多么的难。

我和周政保在70年代中期就认识了，那时我们都在喀什市革命委员会，后来我们先后又都到了乌鲁木齐军区创作组，前后共事，朝夕相处，但我不是十分了解他。他有些东西，隐忍得很深。

当时我们几个连级干部经常同在一桌吃午饭，都不太挑拣，而且很能吃。有一次吃饭时我开玩笑，说咱们这一桌全是好饭量，身体棒，肯吃，包括这个戴啤酒瓶子底儿那么厚的眼镜的周政保，也肯吃得厉害！说完，大家哄堂大笑。

但是唯独周政保没笑，他不但没笑，而且还有一种压抑着恼怒的严肃，他说：“请不要拿别人的生理缺陷开玩笑好不好？”我当时很惊讶，感到他有一种近乎变态的自尊，而这种自尊一定来自屈辱感。

1983年那年，我和周政保一同去了昆仑山，历尽长途到达多玛兵站的那天深夜，又饥饿，又困倦，我俩睡在一个通铺上。凌晨时，他的抽搐把我惊醒，我一看周政保，不知道是高原反应，以为他要死了，一瞬间，我真切地感到丧失朋友的悲痛，差点哭出来。后来经过医疗站抢救，他吸了氧，喝了一碗白糖水，又喝了一碗稀饭，清醒过来了。我说，如果不行就不上山了，咱们可以往回撤。“那怎么行？当然上山了，我没问题。”周政保非常坚定、毫不犹豫地说。这件事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他是一个勇敢、顽强的人，是一个男子汉，他内心有着很强烈的英雄意识。

那次昆仑山之行后，我写了《蠕动的屋脊》，原稿中本来写了这件事，但怕他看了不高兴，又删掉了。

由于周政保走起路来上身略微前倾，所以给人造成一种曲背躬身的印象，掩盖了他体型原有的匀称。有一次他从我家出来，正开自行车锁，我从背后看他，忽然发现他体格匀称，有一些健美的意思。我说：“你的体型还不错嘛！”

他扭过头来把自己的腰腿重新扫描了一遍，咧嘴笑了，以极其憨厚、甜蜜的口吻说：“我体型可好呢！”这时候的周政保一点也不谦虚了，他当仁不让，表情憨傻，与平时的样子判若两人。每个人都有天真的一面，都有对自己把握不准的时候，往往这时候，童稚的可爱倏忽闪出！

到了 80 年代后期，我们俩的关系破裂了，原因并不具体，起于一些传闻。有人告诉我说“周政保说你不读书，凭一点小聪明写诗”，还有人告诉我说“周政保说他提出什么理论，你就用什么实践去证明”，无非就是这一类的小事吧，我这个人修养比较差，听多了就恼火了，于是决定从第二天早晨开始“不认识他了”。这一招弄得周政保“友邦惊诧”，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关系一臭就臭了好几年，我对他毫不犹豫地发起了攻击，逢人便骂周政保。凡是周政保拥护的，我便反对；凡是周政保反对的，我便支持。甚至为此还在徐怀中家里学着当过一次小人，把周政保贬得狗屁不是。这当然是我平生的一个污点。在此数年间，周政保从没说过我什么坏话，他承受了我给他造成的痛苦，也忍受了我肆无忌惮的任性。

到了 90 年代的第一年，新疆作协举办了一次对我的第一本散文集《稀世之鸟》的作品讨论会，《中国西部文学》的副主编郑兴富给我打电话说，“周政保要参加讨论会”。我第一个反应是他肯定来捣乱，老郑劝说我一阵，我说那好，他愿意参加就参加，我不怕。结果周政保不是来捣乱的，他的发言是中肯的、友好的，他的胸怀是开阔的。那个会开得很好。席间，我举杯当众向大家宣布与周政保和好，并且承认了错误在我。陈柏中同志高兴地说：“这件事比讨论会意义大得多！”这也是一出《将相和》，周政保扮演了蔺相如，我

扮演了头脑简单的老廉颇。

周政保比我小两岁，但他表现得比我识大体，还更老练稳重。这和他吃的苦比我多有关，也和他付出的努力比我多有关，我确实应该向他学习。从那以后，我们之间重新恢复了“友好关系”，但那个教训是沉重的，所以我对他变得十分谨慎，小心翼翼，生怕一不小心打摔了一盆好不容易栽培起来的花。敏感的、个性都很强的人之间建立友谊，要比同一般人的交往困难得多，曲折得多，同时也深刻美丽得多。尽管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花不易成活而易夭折，但还是值得为它付出心血。

一般人只知道“文人相轻”，他们哪里能懂得此间的深刻含义呢？在这个表面现象的背后，藏着的是人类精神之海深不可测的暗蓝色的波涛！

现在，我和周政保不在一起已经好几年了，我们没有了利害关系，却变得比在一起时更值得怀想留念。过去的许多事情变得清晰了，凸现出来了，缺点微不足道，优点日益鲜明！作为批评家的周政保，因了深厚的阅历和顽强的底层意识，也因了他过人的勤奋和韧性精神，日渐显示出他与许多批评家不同的作风。他是和大量的作者一样从最初的起跑线出发的，他是经过了层层文坛的淘汰而得以露出头角的，他知道甘苦，他理解文学，所以他没有那种从马拉松长跑的半途突然窜进来、精神格外比别人抖擞的批评家的指手画脚，也没有那种人看什么都很容易的轻浮和自信，更没有那些人闻腥逐臭的赶时髦天性。这是他和很多人不一样的地方，他始终关注的是文学。

作为批评家的周政保还有一个重要的长处，就是他整体把握文学事物的能力，还有从这种把握中体现出来的正确性。他的文章或许不那么新颖、尖锐，但往往是正确的，时隔数年不会变质变味。这说明他是有眼光的，这眼光里含着更多的社会因素、历史因素和政治因素，而不仅是文学的技巧。这就使得他的批评比较稳练，比

较大气，他的有些文章隔几年再读反而显得越好。他的文章在文学上的超前性不那么明显，这方面他不如有一些批评家；但他有一种社会经验上的超前性，在这方面，那些足不出京都的、从未在实际生活中摔打过的先生们是望尘莫及的（顺便说一句，足不出京都和足不出乡里在孤陋寡闻的意思上，本质是一样的）。诚然，北京是文化中心，是人文荟萃之地，但是北京毕竟不等于全中国。北京的人文荟萃首先在于她对各地优秀文化的吸收和接纳，一旦她失去了这种襟抱和能力，马上就会显出苍白和贫弱。

这一点周政保是非常清楚的，文化的活力保存在山野民间，而不断地、有意识地汲取这类源头活水，是一切文学家、艺术家拒腐防惰、保持创作活力的重要途径。

今年夏天，周政保又跑回新疆来待了一个月，他本是个江南游子，却把新疆当成了自己生命的家园。他仍然像过去一样，从不把自己当成新疆的客人。

这个夏天是一个好季节，余秋雨、贾平凹、陆天明、周政保都来到新疆，这也是人文荟萃嘛。谁说“文人相轻”呢？看着这些当代知名的作家学者欢聚一堂，我心里充溢着感动：是啊，这是多么好的文学节日，这是使新疆多么难忘的一些美好时光！

这时，我心头蓦然又响起了周政保抄录在笔记本扉页上的那句桑德堡的诗句：

“任何事情开始时都是梦。”

1996年12月3日写于新疆

关于报告文学创作的六封信

第一封信

一言难尽的领域——值得敬重的作家——题材及“报告”的自觉性——“似曾相识”的剖析——选材亦见功力——智者的谦虚与聪慧

.....

这几年你一直在折腾报告文学创作，身在其中怎能不知庐山真面目？特别是对于军旅题材报告文学的创作状态，肯定要比我更清楚或更明白其中的底细。既然你要让我说一点看法，那我只能“实话实说”。我不想遮遮掩掩地隐瞒自己的观点。

翻翻杂志就知道了，这些年来的军旅题材报告文学创作异乎寻常地兴旺发达，尤其是它的发表数量，几乎可以成为文学繁荣的一种特别的注脚了。这说明包括你在内的作家们一如既往地勤勉与刻苦，且一如既往地在为文学事业作着自己的奉献。然而，数量与质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说实话，对于当今军旅题材报告文学的创作状态，我并不持乐观的评估态度；至于这一领域的趋势，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当前景况的理解。

我无法否认当今报告文学领域的“繁荣气象”，但这种气象只显现为量的递增，而较少见到质的跃进，或者说，我们所见到的“繁

荣”，或多或少带有某种泡沫的意味。当然，这几年来也有一些优秀的或比较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与读者见面，如当代题材有张正隆的《血情》、金辉的《西藏墨脱的诱惑》、江永红的《好梦将圆时》、江宛柳的《没有掌声的征途》、咏慷的《跨越苍茫》、李鸣生的《走出地球村》、徐剑的《大国长剑》，又如历史题材有于劲的《上海：1949——大崩溃》、金辉的《恸问苍冥》、王芳红的《满江红》、李镜的《大迁徙》、茂林和升泉的《马背上的共和国》等等，但在相对庞大的数量面前，佼佼者的声势终究显得羸弱单薄了一些。倘以我的判断论，在这几年的军旅文学创作中，报告文学既是兴旺繁荣的领域，又是模式化倾向比较严重的领域，同时也是作家见解及生活感受力被折损、有意无意地被消解的领域，而所谓的社会文化品位及审美意味，也往往被这一领域常见的“就事论事”方式所淹没所淡化。不言而喻，我的这种判断（或者说是苛求），是建立在最能体现报告文学特质的创作前提下的——我们只能以最高的要求来衡量当今的报告文学创作，因为任何方式的廉价鼓励，既不利于整体水准的提高，也有损作家的自尊感或自信心。

谁都希望自己是最好的作家——我想你也不会例外。而最好的作家，总是那些最富创造性的作家，那些最善于独立思考的作家——显然，报告文学更是如此，因为他们是一个持有崇高使命感的、以文学方式直接卷入现实的“思想者群体”。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对于当代报告文学作家的尊重，乃至敬重，更甚于小说家、诗人与一般意义上的散文家。在我看来，这些作家在直面现实及人生的征途上，几乎没有回避的侧门旁道可走——他们只能凭借自己的信仰、自己的胆识或良知，经由一行行真实的文字而履行“精神文明建设”的社会责任。但，这里的“尽责”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譬如说，报告文学之所以引人注目，除了它是真实的文学性记录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了它的描写内容的新鲜独到——作为生活阅历的补充，报告文学拥有一种其他文体无可替代的开阔视野、丰

富见识与强化社会使命感的功能。小说的故事是虚构的，而报告文学的“故事”则是生活原生态的“复述”或“重现”——很自然，这已构成一种完全不同于小说的强大诱惑，但同样很自然的是，此间的诱惑也隐含着一定的前提，至少是，被诱惑的读者不会乐意去倾听那些从传达内容到叙述方式都呈显重复感的“老而又老”的“故事”。所以我想说，报告文学的“可靠可信”与报告文学的“新鲜独到”，虽则层面不同，但都是应该尽力实现的创作要求：前者是报告文学的基本前提，后者则是体现创造性及作品魅力的重要质核。

说到这儿，我想你已猜到我要说些什么了，而且肯定不是“好话”。的确是这样——我觉得，这几年报告文学中的很多作品，非但谈不上“新鲜独到”，而且还给人以一种“陈旧感”，一种时代色彩比较困乏的印象。若要究诘其中的原因，恐是很难理得清楚的——我在这里只说一点，那就是题材选择。

从理论上讲，报告文学的题材选择并无决定性的意义，甚至与小说创作的题材选择很近似，即“写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样写”。这种说法流行了几十年，以致很少有人去怀疑它的可靠性。实际上，在所谓“写什么”与“怎样写”的理论结构中，隐藏着空洞的不着边际的“逻辑游戏”。我们以前曾激烈地批判过“题材决定论”，但这决不等于题材选择的“无意义”。应该说，无论“决定”还是“不决定”，凡过了头或误入“极端”，都是很荒谬的。在我看来，题材的选择——当你决定“写什么”的时候，其实已经通过了“为什么要写”的过滤，或是对传达对象的意义已经拥有了相应的认识，甚至已经产生了“怎样写”的雏形——这一过程的意义是很容易感受到的。特别是在报告文学领域，因了叙述的非虚构性，题材选择的意义便显得更加突出；所谓“重大题材”与“非重大题材”的分野也要鲜明一些。而这里所说的“重大题材”，也许还包括某些“前沿题材”，即那些特别具有报告文学的“报告价值”的题材，那些特别新鲜或仍处于进行过程中的、极富有时代气息的题材

——江永红的《好梦将圆时》、江宛柳的《没有掌声的征途》，就属于这类“前沿题材”的作品。我想你已读过这两部作品，而且也感受到了这两部作品的“前沿气息”及富有强烈时代感的精神光芒。很明显，这样的作品之所以让人感到“新鲜独到”，敏锐的题材选择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你不能不承认作者之于现实进程的感受力，尤其是那种倾听军队现代化足音与变革旋律的才能，那种意识到报告文学作家应该向读者“报告”一些什么的自觉性……

相比之下，这几年的相当一部分作品确实显得有点儿“陈旧”（对生活的感觉也很迟钝）。恕我直言，其中也包括你“创作”的个别作品。这些既不能说不好、也称不上优秀的作品，所“报告”的人与事——虽也不是“陈年旧账”，但缺少时代感却是事实；或者说，所写之“人”照例是“好人”，所写之“事”也着实是“好事”，可这些“好人好事”却给人以“似曾相识”的印象。你去年发表的那部记叙某部志愿兵先进事迹的作品，给我留下的就是这样一种感觉，那些事例不能说不感人，而你的煽情才华也称得上是一流水准，但在我看来，这作品依然难入佳作之列。致命的遗憾在哪里呢？我想主要在于：你的记人记事很少与人物所置身的急剧变化着的环境联系起来，这样也就淡薄了作品应有的新鲜感与时代质泽——要么是你的疏忽，要么是你的浮光掠影，要么是你受了二流典型材料的影响……说实话，即便是政治部门的典型材料也不应该是“好人好事”的罗列堆砌。

对于报告文学创作来说，题材的选择确实是最重要的。与小说创作不同的是，报告文学对于“写什么”的选择，其本身就是一种作家功底的体现，或一种综合素养的最直接的反馈。《好梦将圆时》警示我们，梦寐以求的现代化开始向我们走来了，我们的承受力究竟处于怎样的状态？有没有勇气迎接现代化观念的挑战？面对全新的“军营风景”，不得不诉诸全新的理解：怎样的军人才是优秀的军人？怎样的士兵才是合格的士兵？这就是严峻的军旅前沿景况，而